



Searching for Nationalism with Neo-Chineseness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derate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Liu Yuedi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ism, moderate, rational, far from being radical, is by all means possible to develop along a new way all to itself. The so called "Moderate Nationalism" is governed by reason instead of passion, and always treads along the middle way of both reasonableness and appropriate sentiments. In the same vein, this nationalism with neo-Chineseness shall always stay within bounds 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n the one hand, it tries to integrate into an order of today's global Cosmopolitanism; on the other hand, 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 is bent or even overruled by demands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Without due regard to people's livelihood, their welfare may suffer from nationalism; similarly, without due regard to democracy,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s a result would be compromised by nationalism. Historically viewed, moderate Chinese nationalism should present a parallel inner structure, with the Han people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enjoying a relationship of symbiosis. Outwardly, the nationalism of Neo-Chineseness upholds the Confucian view of "gradable love" as its principle rather than the "universal love" of the Mohist school, or, for that matter, the Euro-American-centered geopolitics with all its preachings on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Moderate Chinese Nationalism regards the Great Harmony or Great Unity as an ideal of perfect society. Of course, the Great Unity is a harmonious Tian-Xia (glob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way) vision, in which Chineseness does not occupy a central position. However, for the Tian-Xia vision of the more ordinary type, Chineseness becomes one of its key tenets. As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Rites*, "When the Great Tao prevailed, the whole world was one community".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moderate Chinese nationalism, to which the world is for all. Thus, to implement the rul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internally and to apply the kingly Way externally are the active co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is way, not only can we warn against the dictatorial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indiscriminate unification" in China but also oppose the divergent idea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Keywords: Nationalism with Neo-Chineseness, Moderate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Sun Yat-sen, Tian-Xia Doctrine,

Author: **Liu Yuedi**, earned his BA, MA, and PhD from Nankai University in 1997, 2000, and 2003 respectively. He once served as Delegate-at-larg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and is now a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esthetics, Emotion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Analyt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s of Living: Critique of Modern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Spirit*, *Contemporary Art Theory*, *Since the End of Art: Aesthetic Thinking on Art's Duration*, *Aesthetics in Daily Life*, and two books written in English: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Cambridge Scholars, 2014). He is also chief editor of publications such as Translated Works on Art and Aesthetics, PKU Aesthetics and Art Seies.



探索中國式的民族主義

——兼論“溫和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關聯

劉悅笛



[摘要]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新路。這條新路，就是以溫和形態出現而非採用激進方式的民族主義。所謂“溫和民族主義”，即“以理節情”的節制，把握情理合一的“度”的民族主義。它分為對外與對內兩個層面：在對外節制方面，表現為把握適度融入世界主義之“度”。“溫和民族主義”不是拒絕或排斥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而是試圖融入全球體系並做本民族該做之事，從而融入世界主義的拼圖架構當中。在對內節制方面，表現為把握適度收斂民族鋒芒之“度”，變成為民生與民權所限制的民族主義。如果沒有民生為根基，民族主義就會犧牲民生；如果沒有民權為前提，民族主義就會傷害民主。

在此基礎上所體現出的中國式民族主義新路，對內應該是“複線式發展”的民族主義，多數民族與各個少數民族共生協進。對外則是以儒家的“等差愛”為準則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愛”為標準，更不同於以歐美為中心的那種看似平等等愛、實則差之遠矣的國際地緣政治體系。中國式的民族主義走的是“大同”之路，而不是當今一些學者主張的“天下主義”之路。“大同”與“天下”，兩種觀念似乎並不矛盾，大同所指就是天下大同；但是，兩者其實是有矛盾的，“大同”不是以本我文化為中心的，而天下則預設了中土的本我。因此，從本質上說，天下大同中的“天下”是“天下為公”的，而“一天下”中的“天下”則藏有偏私。無論是當今的世界主義背後所預設的歐美中心主義，還是中國古代墨、荀所主張的“一同天下”或“一天下”背後隱匿的本土中心主義，皆非中國式民族主義的正途。

[關鍵詞]中國式民族主義 溫和民族主義 世界主義 孫中山 天下主義

[作者簡介]劉悅笛，1997年、2000年、2003年在南開大學分別獲得文學學士、美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五位總執委之一；主要從事美學、情感哲學與中國思想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分析美學史》《生活美學——現代性批判與重構審美精神》《當代藝術理論》《藝術終結之後——“藝術綿延”的美學之思》《生活中的美學》，英文著作有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主編有“美學藝術學譯文叢書”“北京大學美學與藝術叢書”等。

1993 年，印裔歷史學家和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澳中》（*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解構中華民族》，其中提出了一個歷史預判，即中國思想界正在實現從“文化主義”（culturalism）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內在轉換。^①從近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看，中國在經過 20 世紀 80 年代“文化熱”、90 年代“保守主義”居主導之後，當今民族主義的全面勃興，無疑是應驗了杜贊奇的預言。對此，中國學者李澤厚則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他在 2010 年與易中天的對話中認為，一旦由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主導，將有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力行專制的危險，從而存在走向國家／民族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的可能。^②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也極不贊同“天下主義”的觀念；但在 80 年代“反傳統”達到高潮之際，他曾說過，如果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得非常好的話，儒學在未來世紀會對人類有重大貢獻，近年來又從近代儒學中提煉出了“中國式自由主義”^③。其實，這裏的問題關鍵在於，是否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都不可取？難道民族主義就一定是激進的嗎？一種與激進相對應的溫和形態的民族主義是否可能？我認為，一種“溫和民族主義”（Moderate Nationalism）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這種理性化、有節制的民族主義也是當今中國所需要的。

一 “民族主義”的三個關聯層次

與“世界主義”往往被視為進步與開放不同，“民族主義”常常被看做是狹隘與保守的象徵。這種觀念的形成，與近現代以來德國的納粹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日本思想界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急劇流變為“軍國主義”、從而走向“大東亞共榮”的迷局有直接關聯，它們共同向世人展現了西方和東方激進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後果。

然而，這種觀念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是偏頗的，民族主義其實並非是應被拘禁的“魔鬼”。從理論上說，“民族主義”可以在三個關聯層次中得到確立：

其一，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以及“地域主義”的關聯。愛國主義是以“屬地性”為基礎的情感關聯（靈長類動物的守地行為也為地域主義提供了生物根基），而民族主義則歸屬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的“現代性”共生品）。其特殊性就在於，它是作為“想象共同體”及其共同價值取向而存在的。

其二，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關聯。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歷史糾葛，使得民族主義被置於國際（國與國之間）的層級上。在這個層次上，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皆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利益。歐洲民族主義崛起勃興於反帝主義，卻終成帝國主義，這種“帝國誘惑”的教訓是當今發展中的大國需要警惕的。

其三，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以及“天下主義”的關聯。民族主義如果完全融入世界主義，那就喪失了自身，還是應與世界主義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然而，一些學者所主張的中國式的“天下主義”，卻可能成為戴着“世界主義”面具的當代民族主義，往往會將中國統領世界變成內在訴求。在“天下”觀念這種中國式普遍主義的背後，仍深藏着文化相對主義的秘鑰。

二 民族主義走向“溫和”何以可能？

對民族主義作“激進”與“溫和”之分，將使人們理解、實踐民族主義時作出相應的取捨。但反對者或許會追問：究竟什麼是“溫和民族主義”？遇到具體情況時，能否將“激進”與“溫和”

^①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該雜誌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1995 年後改名為《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

^② 易中天、李澤厚：“警惕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新京報》，2010-09-18。另見李澤厚：“關於民族主義”，《明報月刊》3 (1993)；李澤厚與劉再複對談“關於民族主義”（1996），載《劉再複對話集：感悟中國，感悟我的人間》（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

^③ 李澤厚、干春松：“未來中國政治之走向——關於‘中國式自由主義’發展路徑的對話”，《南國學術》1 (2014)。

真正區分開？

所謂“溫和民族主義”，從總體上說，分為對外與對內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都需要“以理節情”的節制，都需要把握“情理合一”的“度”。

在對外節制方面，表現為把握適度融入世界主義之“度”。“溫和民族主義”不是拒絕或排斥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而是試圖融入全球體系並做本民族該做之事，從而融入世界主義的拼圖架構當中。

在對內節制方面，表現為把握適度收斂民族鋒芒之“度”，變成為民生與民權所限制的民族主義。如果沒有民生為根基，民族主義就會犧牲民生；如果沒有民權為前提，民族主義就會傷害民主。

在中國，民族主義曾被已故漢學家史華茲（B. I. Schwartz, 1916—1999）視為是一種“想像共同體”。它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准宗教”意義上的支撐，並成為實現其他目標的必要工具。^①按照他的見解，“一旦國家的民族主義模式被確立下來，這種民族化的模式就會被集體的行動者們所接受下來”，但在中國卻面臨着更為全面複雜的現代性的格局，並與前現代的文化之間形成了複雜甚至悖論性的關聯。^②

當代中國的文化進程似乎已進入“超現代”（trans-modern）階段：先發展起來的大城市在某種程度上已部分的進入了後現代文化當中，而未發展的許多地域甚至還是前現代的，這就構成了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共存與交融的“超現代”局面。史華茲所論說的民族主義，主要還是基於“現代—前現代”的架構；然而，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卻處於全球化的歷史語境當中，並與“世界主義”思潮之間出現了某種內在關聯，從而呈現出更加複雜的面貌。

一方面，那種深入知識分子骨髓的“民族主義”，與深化到民間人士內心的“民粹主義”，如果二者得以結合，可能會形成一種共謀的危險——“極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資源的需求，中國軍事現代化對自身核心利益的捍衛，使得一些海外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勃興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產生聯想，進而潛意識地誤解、擔憂或反彈。在這雙重背景的交織下，未來的中國不是要不要民族主義，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正確的選擇祇能是走“溫和民族主義”的路線。它作為激進民族主義的反面，是一種與德、日等國“崛起”時對外訴諸武力征服、對內獨裁強權有着本質區別的民族主義。這就意味着，“溫和民族主義”的關鍵是將民族主義的內外方略限定在可操控的範圍內，既不讓知識精英們的“理性化”民族主義過猶不及，也不讓“大民主”導致民族“情緒化”而失控。這就是“溫和”的真實涵義。

按照史華茲的理解，民族主義在中國是“現代性”的產物。“民族主義是興起於現代的產物，因民族主義而需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相當程度的自尊心”，這是“現代對民族主義的需要”。^③但是，這種現代思潮的形成，也要從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來看。從內部來看，中國本土思想者們正在實現着一種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從原本的文化反思逐漸上升為一種民族思潮。從外部來看，“新左派”倡導“中國性”，與主流意識形態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自由派”表現出的將儒家與自由思想嫁接的新趨勢，恰恰說明了它也在向民族主義靠近。這不僅有利於當今中國思想的整合，也為“大啟蒙思想”（既揚棄西化啟蒙的消極要素，也擴充中國啟蒙的積極因素）提供了最佳歷史契機，由此可以獲得相互交流與彼此融匯的新思想平臺。

三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張力：對孫中山思想的借鑒

如果說，民族主義通常是以民族與國家為本的，那麼，世界主義則是以人類與國際為本的。

^{①②} Benjamin I. Schwartz, “Cultural,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9—250.

^③ [美]本杰明·史華茲：《思想的跨度與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第25頁。

這就使得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張力，同時也意味着，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基本上是“並流”的。

既然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存在張力，一種與“世界主義”合流的民族主義是否可能？在20世紀初，孫中山（1866—1925）所設想的“三步走”民族主義為這種可能提供了答案：第一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步，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全體解放；第三步，世界各民族共進大同世界。^①這種獨特的民族主義，改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局限，使之融化為廣義的世界主義了。也就是說，他的第一步還是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內在統一），但在第二步則走向反帝主義了（民族解放），第三步更是基於本土的“世界大同”思想了。也可以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一方面，他強調了國內各民族融合而終成中華民族；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從而實現全世界民族解放。這無疑具有了恢宏的“全球視野”。

1919年，可以被視為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成熟的一年，因為他走出了早期“驅逐韃虜”的那種政治策略性思維，認為民族主義要從“消極目的”走向“積極目的”：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祇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而為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決不久必能駕美歐而為世界之冠。^②

這意味着，復漢反清祇是民族主義的消極目的（也是短期政治目標），而以漢、滿、蒙古、回、藏五族為代表的民族融合纔是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也是長期政治理想）。有此“民族之新主義”而化為“世界之新主義”，不僅將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還希冀“駕美歐而為世界之冠”。

到了1921年，五族共和、大中華民族的觀念在孫中山那裏變得更為深入：“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於文化及精神的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③之前的1912年9月1日，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上的演說也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因為各民族同胞“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④，這毫無疑義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基本規定。

更為關鍵的還在於，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中所內涵的“世界化”要素：對於境外，也就是在國際範圍內，“要中國與外國平等”“世界人類各族平等”，這是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講的。透過這一政治宣言的背後可以發現，這種世界主義的提出，根底仍是一種民族主義，也就是要將中華民族提升到與世界各民族（尤其是發達民族國家）平等的地位上去。這纔是孫中山更大的政治抱負。

然而，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是，孫中山強調的仍是“王道之治”而非“霸道之治”，這無疑是儒家傳統精神的延續。孫中山在《民族主義》中說道：“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這種特別好的道德，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⑤這意味着，本土化的民族主義也可以走“和平之路”，而且這也恰恰是華夏民族的基因所致。

從古代歷史看，中國的發展大致有兩種模式——“唐代模式”與“元代模式”。前者是“文

^① 吳鼎：《民族主義與中國倫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第17頁。

^② 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卷，第187—188頁。

^③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頁。

^④ 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卷，第430頁。

^⑤ 孫中山：“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9卷，第246頁。

化縱橫天下”的模式，以開放的胸懷接納外來者並使其為我所整合，當然也不排斥小規模的戰爭，如唐朝擊敗突厥後又利用突厥經營作為自己邊疆的西域地區。後者則是通過大規模的長年戰爭實現的，但這種“武力征服天下”模式儘管在空間上佔有了更多的土地，卻無法在時間上長期延續，因為缺乏文化的“播種生根”。顯然，孫中山所嚮往的和平之路更接近唐代模式。

孫中山的“民族之新主義”向後人表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新路。這種新路對內應該是“複線式發展”的民族主義，並不囿於所謂“五族”（滿、蒙古、藏、回、漢）共和，而是多數民族與各個少數民族的共生協進。這也意味着，孫中山所認為的中華民族具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結構的五重標準——血緣／種族、語言、習慣、宗教和生計，也需要作出一些調整。因為，中華民族間的血緣與種族大有差異（漢族內部也是同化了諸多血統），少數民族語言與習慣各有差異（目前所確定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確定，從事實上看更多具有政治身份給定的意味），就連漢族內部的儒、道、釋也是多元的，中原農耕與邊疆、沿海地區的生計更是迥異。所以，民族主義必須接受內部的複線化，就像也要接納外部國際間的複線化一樣。

這種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對外乃是以儒家的“等差愛”為準則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愛”為標準，更不同於以歐美為中心的那種看似平等等愛、實則差之遠矣的國際地緣政治體系。這也意味着，在民族主義向世界主義的融匯當中，起碼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墨家通過“兼相愛”的路途從民族主義融入世界主義，另一種則是儒家通過“等差愛”的途徑從民族主義融入世界主義。由於國與國之間的等差明顯存在，儒家的思路似乎更能勝墨家一籌。中國式的“愛有等差”而又能“推愛”的民族主義，更能與世界主義之間保持一種具有彈性的關聯。

總之，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對內實行的是“仁政之治”，對外實施的是“王道之治”。這是具有中國特性的民族主義的積極內核所在。它作為民族主義的溫和形態，既可以在內部防止“大一統”觀念泛化，又可以在外部反對“天下帝國”觀念發散。

四 天下大同絕非“一天下”觀

中國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走“大同”之路，然而一種來自儒家的“天下主義”觀念卻在學界漸成氣候。那麼，大同觀與天下觀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大同”與“天下”，兩種觀念似乎並不矛盾，大同所指就是天下大同。但是，兩者其實是有矛盾的，“大同”不是以本我文化為中心的，而“天下”則預設了中土的本我。這在“一天下”的觀念中最為凸顯。

“一天下”思想的雛形，可以在《論語》的“一匡天下”與“天下歸仁”那裏找得到。在《憲問》篇中，孔子（前551—前479）讚譽齊國的管仲（前723—前645）“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①；但在《顏淵》篇卻又記：“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②這兩處“天下”，涵義顯然是不同的。

“一匡天下”更多是就政治一統而言的，而“天下歸仁”則是將公域歸之於私域問題。緊接着，孔子又說“為仁由己”，“這也說明孔子將實踐外在禮制化作內心欲求、融理欲於一體而成為情（人性，即仁）的具體過程”^③。從“克己復禮為仁”的基本主張來看，在孔子天下觀那裏，公私本來未分；其“天下”觀乃是一種“有情”的世界觀，希望天下人人歸仁，天下人心淳樸，由此，方能世道清明，天下終歸於仁。

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前372—前289）一方面也主張天下“定於一”：“‘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④但另一方面又認為，

^① 《論語·憲問》（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② 《論語·顏淵》。

^③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217頁。

^④ 《孟子·梁惠王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

祇能通過“施仁政”的道路使天下爲一，這似乎又回到了“天下歸仁”的理路：“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①兩人的表面差異在於，孟子論善，而孔子說仁，但皆是從“個人”到“天下”的思路；更微妙的差異則在於，孟子是從勸誠君子的立場出發，希望從單個人的服從到天下都能服從，而孔子則是直接訴諸仁端，天下歸仁乃是心悅誠服。

荀子（前 313—前 238）儘管與孟子的思想差異較大，但也持“一天下”的觀念，或者說更明確地主張“天下歸一”，而其政治思考仍是從“服”的角度：“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②這其實倒與墨子（約前 468—前 376）所主張的“一同天下”觀近似了：“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③在這個意義上，荀子與墨子的差異，似乎要小於孟子，因爲孟子仍是希望從內在的仁心推出仁政，而荀子則直接訴諸於“隆禮重法”的外在化路徑：“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塚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④而之所以能達到“一天下”，前提就是要“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⑤！

在當今世界主義思潮全球勃興的時代，世界主義者似乎更青睞於墨子之路，荀子之道也是可以接受的。問題在於，“天下大同”與“一天下”的觀念，哪個更可取呢？從本質上看，天下大同中的“天下”是“天下爲公”的，而“一天下”中的“天下”則藏有偏私，這一點恰恰被人們所忽視了。進而觀之，無論是當今的世界主義背後所預設的歐美中心主義，還是中國古代墨、荀所主張的“一同天下”或“一天下”背後隱匿的本土中心主義，其實皆非中正之論。

總之，當今中國需要走一條“溫和的民主主義”之路。如果從世界政治博弈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就不同於“國家主義”，後者可能去做不平等的侵略，進而走向與之不同的“帝國主義”，而激進的民族主義的危險正在於此。民族主義如若失去民生主義的基礎，那就成爲沙上建塔而極易傾覆；民族主義如若失去民權主義的基礎，那就會傷害民主；民族主義如若沒有經濟發展做支撐，就會因失去民衆的支持而走向衰微。中國式民族主義的實質是“溫和的民主主義”，它不是拒絕或排斥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而是試圖融入全球體系並做本民族該做之事，從而融入世界主義的拼圖架構當中。

^① 《孟子·離婁下》。

^② 《荀子·非十二子》（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③ 《墨子·尚同中》（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④⑤} 《荀子·王制》